

论微文化时代的传播生态与高校道德教育调适

阎国华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微文化的流行是技术支撑、文化发展、社会变革和人类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微文化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流程、方式以及范围,直接触发了以便捷性加剧与获取快速性、扁平化传播与获取个体性、社交化传播与获取群体化、随机性浏览与获取碎片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传播生态。新型传播生态对高校道德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包括先入为主与思想占据、权威崩塌与神圣削弱、群体分化与对象复杂等严重威胁传统高校道德教育体系的问题。为了应对挑战,高校道德教育需要从主动对接以求实现理性驾驭、构建积极价值信息传播体系、挤压不良信息传播生存空间三个大的举措出发,以实现微文化时代新型传播生态的积极应对和有效驾驭。

关键词:微文化;信息获取;传播生态;高校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6)05-0178-05

作者简介:阎国华(1977—),男,河北邢台人,管理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科技哲学研究。

微文化的概念最早源自著作《微的哲学》。在该著作中,作者认为微文化是一种以微不足道的力量通过逐渐积蓄的方式悄然改变人类生活的新型文化样态^[1]。这一概念的归纳主要基于微文化发挥作用的方式,但微文化不仅是逻辑上的以小见大,形式上的短小精悍也是其显著特色^[2]。同时,也有学者基于微文化呈现的方式,提出了微文化的个性、自由、草根、青春等关键属性^[3]。因此,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的含义统一在一起,就可以给微文化下一个定义。具体来说就是:以微博、微信等为主要技术载体,以“微某某”为主要表达形式,以言简意赅、微言大义、以小见大、自由参与等为核心特征的文化新样态就是微文化。微文化的流行一方面是信息技术、智能

移动终端设备以及现代传播理念创新等因素推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大学生生活模式碎片化、猎奇心理驱使以及高等教育创新的结果。微文化的流行显著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供给方式和获取方式,孕育了新型的传播生态,进而还必然会影响高校道德教育工作的方式和结果。

一、微文化时代的传播生态变革

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相对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手段,微文化模式下的信息传播在传播速度、传播流程、传播方式以及传播范围等多个传播属性上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由此形成的新传播生态改变了信息的存在和传播状态,引发了学生信息获取模式的显著调整,具体主要体现在

收稿日期:2016-06-01

基金项目: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JGLX15-04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4ZDAXM005)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便捷性加剧与获取快速性

如果说网络技术在信息传播快捷性上大大超越诸多传统媒体,那么微文化的流行则更加彰显了这种优势。不仅如此,“互联网+教学”“互联网+手机”等“互联网+”的概念正在走向社会各个领域。在微文化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快速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几项重要的变化:其一,智能移动终端的流行与普及。伴随着功能上的优化和价格上的走低,近几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迅速流行,在大学生中间的普及率更是超过社会公众平均拥有率。而且,相比以往,今天人们对智能设备功能的向往更加强烈。例如,据统计近三分之二的人期待手机在通话功能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其他功能^[4]。同时,就实践来讲,目前已经有很多学生应用手机来应对各种学习任务。这种变化让以前主要关注室内技术和设备的教育技术研究不得不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让教育信息走出教室的问题^[5]。其二,微文化在互联网的基础上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传播方式的限制。微博、微信、微视频等传播形式大大缩减了信息的加工时间、降低了传播难度、提高了传播效率。其三,网络和移动运行服务行业发展迅速。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服务日渐融合,网络速度、信号质量、服务费用等都有很大发展,原来价格高昂的一些移动信息服务项目开始在大学生的群体中广泛普及。基于以上几点变化,微文化条件下的学生信息获取开始变得更加便捷也更加迅速,加上学生之间的交流频繁、领域宽广,很多时候学生经常能比教师更早地获取一些相关资料。

（二）扁平化传播与获取个体化

在微文化背景下,以权威结构开始崩塌、传播地位开始趋同、“去中心化”日益明显为核心特征的扁平化传播模式开始占据传播方式的主要位置。在信息扁平化传播模式下,信息的接受者和发布者的地位趋于均等,甚至出现重叠和互换。扁平化传播模式对于大学生的信息获取影响巨大,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学生信息获取的整体性被冲淡,个体性开始凸显。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微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公众的媒介接近权和媒体使用权,并且使得这种接近和使用更加简单、便捷^[6]。其二,教师或官方媒体给学生的外在压力逐渐变小,使得个人好恶、个人思考在信息获取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微博、微信还是 Face-

book、Twitter 等都一直在尝试如何通过技术使人们在遇到相同问题时能产生不同的个人思考^[7]。同时,个性化本来就是微文化状态下信息主体参与信息传播和进行信息获取的主要依据^[8]。其三,在教师或官方媒体的信息加工、优化和给予环节被弱化的情况下,个人信息获取能力、获取途径、获取工具、信息鉴别力、媒体素养层次等重要信息获取要素开始严重影响个体信息获取数量和质量。以上几点重要变化都会导致大学生信息获取状况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直接表现为大学生信息获取的个体性特征愈加明显。

（三）社交化传播与获取群体化

如果说互联网为信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平台和基础,那微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对信息传播进行了限制,将信息传播限制在了一定的交际圈内,呈现出强烈的社交化传播特点。以微博、微信为例,获取微博信息需要添加关注、获取微信信息则首先需要成为好友。上述两个主要微文化平台的信息传播功能都将信息传播限定在了特定圈子范围之内。作为维持信息传递或者说交换关系的媒介,其知识信息传播功能需要通过社交才能得以实现和流行^[9]。成为好友、相互关注、进行朋友圈浏览等方式构建起来的信息传播路线都具有强烈的社交化特点。尤其是微信这种相互认证、成为好友才能形成一条信息流动的方式基本上属于一种闭合流动。由于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往往相互熟知,加上彼此地位均等和相互信任,社交化传播具有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形式自由、信息可靠性高、接受度好等突出优点,属于一种高效的信息传播方式。但是,有社交就有社交圈的问题,而社交圈的组成和范围往往会导致学生信息获取出现群体化倾向。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源自两点:其一,社交圈的规模不一。由于受到个人性格、交际范围、社交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学生的社交圈的大小经常存在显著差异,以至于其内部信息流量的规模常常影响大学生信息获取的状况。其二,社交圈的价值观念趋同。社交圈的形成往往依靠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志同道合作为纽带,其形成过程呈现群体价值的循环性强化特征。受这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交圈内信息的流动范围也常常与共性价值观息息相关。

（四）随机性浏览与获取碎片化

相对于传统教育模式下有计划、有层次、有规律的信息给予,微文化时代的信息获取更多依赖学生的自主性行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有:其一,教师所发挥的索引作用消失。受教师作用被弱化的影响,微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知识获取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空间,这在有利于其信息获取积极性的同时也极易导致其信息获取的漫无目的性,结果使得其开始用随机性浏览代替指定性阅读。其二,微文化的流行加剧了知识的海量化传播,进一步打破了传统信息发布的清晰性、层次性和逻辑性,这也是推动随机化浏览代替有计划的知识索求的重要因素。其三,微文化时代信息传播还会呈现泛传播趋势,打破了知识的索引规范。在微文化时代,知识不断被传播者所加工和重新发布,知识索引体系的严密性常常被破坏,同样的信息标题对应的信息却可能千差万别,无形中进一步加大了学习信息获取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机性。

二、新型传播生态对高校道德教育的挑战

作为当前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名片,微文化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知识信息膨胀、传播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人类生活节奏加快、认知方式调整和心理需求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高等教育不断创新的结果。正如教师知识供给与学生学习之间关系十分密切一样,大学生的信息获取状况与道德教育关系也十分密切。微文化带来的新兴信息传播特点改变了既有的信息传播模式、传播生态,由此给传统道德教育带来创新机遇的同时,更多的却是挑战。具体来说,这些挑战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先入为主与思想占据

微文化传播手段所独具的传播速度快、传播信息量大、传播适时化强等特点,不仅促成了大学生信息获取途径的多元,也大大前移了大学生信息获取的时间。信息获取时间的变化会严重影响传统思想教育的流程,让传统道德教育的介入在很多问题上显得相对滞后,容易错过最佳的教育时机以及增加教育难度。这种先入为主所形成的思想占据对于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影响主要源自三个方面:(1)先入为主本身的优势。大学生的思想就像一块领地,谁先占据了就往往占据了主动。长期的教育实践表明,先入为主的思想会主导印象的力量,更加容易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这种效应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2)教育环节增加的风险。如果大学生先行获取的信息是科学规范的尚好,一旦学生通过网络获得的信息并不正确或者并不完全正确,还会无形中进一步加大道德教育的难度和工作量。因为相对于直接的思想给予,这种情况下的道德教育过

程还要增加一个纠正或者祛除错误思想的过程。这好像绘画由直接渲染变成先擦除再渲染一般。(3)信任带来的信息影响度差别。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依赖,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很多信息在传播时被增添了信任资本。被注入信任资本的信息会增强其在大学生思维中的占据能力,从而势必会加剧纠偏的难度。

(二)权威崩塌与神圣削弱

在传统信息传播过程中,教师或官方媒体占据着信息传播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向周围发散式的传播模式,自然构筑了教师或官方媒体与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传播势能差,并维系着信息传播的单向性、排他性和权威性。而在信息扁平化传播模式下,信息的传播中心开始多元,甚至出现信息接受者和发布者之间的位置互换、重叠和模糊,由此可能会引起教师主导型权威结构的崩塌,教师、学校在思想教育中的神圣性被削弱。权威结构崩塌和神圣性削弱对于大学生道德教育影响颇多,其主要的挑战包括:(1)信息的单纯性被破坏。信息发布中心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信息的多元化,这就要求教师在向学生灌输正确的知识之前,首先要帮助学生祛除不科学、不准确、不严谨的信息。(2)既有信息传播过程被干扰,传播效率受到影响。由于教师相对于学生在信息占有、职能分工等方面占有的优势地位,传统信息传播中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势能差。这种势能差对于加快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传播速度,提升其信息传播积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微文化对这种传播过程形成了挑战。(3)信息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受到挑战。微文化将互联网时代的平等、去中心化和反权威精神演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促成的信息传播扁平化和信息来源多元化在瓦解教师、学校等传统信息传播中心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瓦解了他们所传递信息的神圣性和权威性。

(三)群体分化与对象复杂

在微文化时代,由于信息获取所受到的外部干扰因素日益增多,大学生内部也开始出现了群体性分化。按照不同的因素,这种分化可以分为几种主要的形式:(1)基于信息获取能力的分化。受信息传播方式变化的影响,个人信息获取能力在微文化时代变得至关重要。具体来说,信息鉴别能力、信息获取工具、个人交际范围等都会显著地影响大学生个体信息获取的状况,进而引发个体间信息获取不平衡和个人信息获取分化。(2)基于社交形成的分化。微文化时代信息的社交化传播问题日渐突出,而社

交圈的形成机理和运行特点可能会导致学生信息获取的组群化和自我封闭,引发不同社交圈之间的群体性分化。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社交圈的形成往往依赖于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是社交圈内又倾向于推送符合团队价值取向或可愉悦自身的知识信息。无论是基于信息获取能力还是基于社交化因素,学生的群体分化问题都会催生教育过程中的个性化需求,从而增加道德教育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三、微文化时代高校道德教育的应对策略

微文化的流行显著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供给方式和获取方式,催生了新型传播生态的出现,同时也给高校道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高校道德教育需在充分考量微文化时代新型传播生态的影响作用和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应对,以最大程度地引导其理性力量,规避其不良影响。

(一)正视问题,主动对接以求实现理性驾驭

微文化进入人类社会似乎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其动力既来自相关技术发展、生活模式变迁,也包括人类的心理驱动和现实需求。面对这种趋势,高校只有正视问题、主动对接、顺势而为,才能不被变化所抛弃并实现对其的理性驾驭。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高校道德教育需要主动调整,积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1)正视微文化的存在和影响。开放性的学习文化已经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改变高校教育教学生态^[10]。对待微文化,高校道德教育工作者不能盲目拒绝或敬而远之,而要重视它、研究它、应用它,要牢固树立思想领域的阵地意识,让道德教育主动融入微文化,而不是排斥微文化或被微文化所排斥。(2)深入研究微文化时代新型传播生态和大学生信息获取特点。鉴于思想教育与信息传播、信息获取的独特关系,高校道德教育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微文化语境下的信息传播和获取规律,找出微文化的应用之途,解决好高校道德教育如何融入微文化的问题。(3)始终把握微文化语境下高校道德教育的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对微文化语境下高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开展系统研究。在这里,话语就是围绕着特定语境中的特定文本所形成的传播实践和社会实践^[11]。话语体系的问题就是要始终把握“说什么”“怎么说”这一中心问题。(4)探索新的工作机制,关注教师思想角色转变,注重教师自我发展。为了应对微文化影响,教师要学会如何把握学生信息获取变化的动态,要学会如何使用微文化

信息工具,因为让不懂微博、不知微信的教师去执行微文化的思想教育创新肯定是难以想象的。

(二)有效利用,构建积极价值信息传播体系

思想领域就像阵地,既要研究对方的攻占策略,还要研究自身的防守策略。对于高校道德教育这块阵地而言,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正视微文化问题,深刻研究其背后的传播现象、传播规律和相应影响,还需要顺势而为,充分发挥微文化快速、海量、受众抵触性低等优点,有效利用相应技术和手段,构建积极价值信息的传播体系以守好阵地。具体来说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重视碎片化技术的应用,拓展相关教育途径。大众传播不能左右人怎么想,但却可以左右人想什么^[12]。微文化催生了传播技术的大发展,导致了大学生信息获取的多元化,这也为道德教育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性和可能性。例如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微视频、微小说等传播教育信息,凝聚精神信仰,挖掘人文内涵,都是微文化时代很好的信息传播途径。(2)顺应潮流,立足传统资料数据库,结合微文化条件下的传播需要,研发一批优质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又为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开放性道德教育碎片化传播资源。例如,高校可以将一些传统道德教育资源制作成为微电影、微小说、微视频、微知识等便于推送和传播的文化载体。(3)加强主流组织机构建设,打破信息封闭。微文化条件下极易形成的信息茧房对学生的学习和个人成长都非常不利。信息茧房容易挫伤学生的社会存在感,而社会存在感对一个人参与社区、建构自我具有重要意义^[13]。高水平的社会存在感对于个人融入大范围的社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4]。因此,配合道德教育,高校应该积极推动主流学生组织建设和主流学生活动开展,引导学生走出小圈子,以克服信息茧房催生的认识偏激、信仰盲目甚至某些极端主义情绪。

(三)多措并举,挤压不良信息传播生存空间

虽然让微博不“轻薄”、让微信有“威信”一直是全社会对微文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共同期待,但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由于权威结构崩塌、参与化传播以及信息茧房效应等问题的存在,微文化信息传播质量常有泥沙俱下之嫌,呈现良莠不齐之态。因此,在正视和利用微文化的基础上,还要尽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消除或抑制微文化的非理性力量,尤其是其中最主要的不良信息蔓延问题。具体包括:(1)注重学生媒介素养培育,提高信息鉴别力和掌控力。所谓“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

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15]。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可以让“流言止于智者”。(2)开发相应检测技术,跟踪信息传播动态,及时阻止和纠正不良信息。如果不对不良信息及时纠正、任其肆意传播,可能会让其上升为主流意见并引发多数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问题^[16]。目前,微博、微信等主要微文化传播平台的信息检测问题仍然偏弱,加之部分传播个体的传播道德缺失,使得各种不良信息大行其道,亟待相应技术创新来加以克服,及时阻断不良信息,挤压其生存

空间。(3)形成工作机制,建立不良信息应急处理机制。信息的传播常常存在表达和沉默的较量,而且表达和沉默的较量还呈现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正确信息和不良信息时刻在此消彼长^[17]。同时,既往实践也表明,有效沟通、及时沟通对于祛除不良信息、还原问题本原十分重要。例如,非典时期、禽流感时期我国都爆发了或大或小的抢盐风波,但在日本“3.11”大地震发生以后部分地区出现抢盐动向时,因为官方媒体及时启动应急处理,适时澄清了相关问题,有效避免了新一轮抢盐风波的出现。

参考文献:

- [1]石裕东,邢起龙.微文化内涵初探[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3(6).
- [2]周滨,裴艳庆等.论中国文化变迁中微文化的发展研究[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 [3]陶东风.理解微时代的微文化[G]//汪民安,盖琪,等.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
- [4]Jared Keengwe, Malini Bhargava. Mobile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of Mobile Technologies in Education[J].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4(19).
- [5]Thomas Menkhoff, Magnus Lars Bengtsson. Engagi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Mobile Learning: Lessons Learnt in a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Course[J].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 Practice. 2012(11).
- [6]马衍鹏,张果.从微博看当前的“微文化”传播[J].青年记者,2010(6).
- [7]Pamela E. Walck. Book review: Twitter: Social Communication in the Twitter Ag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2013(3).
- [8]朱海松.微博的碎片化传播[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3:15.
- [9]Adam M. Goldstein. Digital Tools for Bringing Evolution to Everyone[J]. Evolution Education Outreach. 2011(4).
- [10]Ulf-Daniel Ehlers. Open Learning Cultures: A Guide to Quality,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for Future Learning[M]. Springer, 2013:1-5.
- [11]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M].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 [12]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64.
- [13]Chih-Hsiung Tu, Marina Stock Mcisaac.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Presence and Interaction in Online Classes[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2002(16).
- [14]Charlotte N. Gunawardena, Frank J. Zittle. Social Presence as a Predictor of Satisfaction Within a Computer Mediated Conferencing Environment[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1997(11).
- [15]张志安,沈国麟.媒介素养: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 2004(5).
- [16]J. Nicole Shelton, Jennifer A. Richeson. Intergroup Contact and Pluralistic Ignoranc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5(1).
- [17]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01.

[责任编辑 彭筱祎]